

书刊评介

一种值得推荐的有温度的历史研究

——评《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

魏宝涛 何明星*

早在1948年，美国人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史研究中心，开始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艾伦·内文斯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整理和记录美国一些显要人物的回忆资料，这可以说是“口述史”这个概念及说法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较早记载。正如每一种创新都将带来某些领域内的些许改变，“口述史研究”也被赋予了创新开拓的先锋角色，它被赋予了一种研究当代历史的新方法和能够带来新的领域拓展的角色期待。史学界目前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与认同、归属，也就是历史研究者们可以运用口述方法，借助（或者依托）相关历史、事件见证者、亲历者的经验与诠释，能够在一定历史事件、一定社会生活、一定的人际交往等层面获取更为丰富的、更多细节质感的整体状态与情貌，使冰冷的历史研究具有了人性的温度。

目前人们比较熟知的乃是以文献、档案资料为主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特色就在于能够运用访谈和访问的方式来有效收集被访问者（受访人）对于某特定历史事件的观点和亲身经历以及相关故事等。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口述史研究”乃是一种较为鲜活的历史学研究，或者说是一种会说话的历史学研究。^①当然也正如人们所理解的，口述历史主要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和梳理。同样，在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看来，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②。如果能够在官方档案资料的记载以

* 魏宝涛，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李向平、魏扬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 [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页。

外找到呈现历史真实的细节以及来自于社会阶层中那些社会大众和社会底层的声音，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口述史研究的重要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则是表现在它不仅仅能够呈现出一种“社会记忆”或者是“活的历史”，而且也有凝聚和提炼来自于（当然是相对于官方正统的档案资料的呈现而言的）个体的一些认同、行为和记忆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某种有价值、有意义的关联。翻阅《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以下简称《我们的记忆》）一书，给笔者最大的感受恰恰就是上述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处理方式的典型成果。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以一种运用口述访谈的方式来了解和梳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重要关联。仔细来看，口述史研究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恰恰在于找寻到某种重要的关联。这也似乎能够为人们挖掘出丰富文本资料呈现之外的某种可能性空间、更多值得考验和核实的细节以及更丰富的资料文献。面对同样的资料和文献，可能会有不同的切入视角和角度（倾向），而随后所针对的资料整理与诠释也就有不同的发现与结果，抑或有不同的呈现。当然在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层面，以回溯方式借助口头叙述来记录，存储那些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个人的观点、观念与主张，从而能够获得与某些特定历史事件密切关联的珍贵资料及典型细节。

口述史研究最为珍贵的价值恐怕还是突破传统史学研究主要依托文字资料的限制，将历史的取材与资料来源深度拓展到一定的访谈对象及相关人士的典型叙述与经历中。这在口述史研究领域乃是赋予普通民众和民间社会言说、解释与说明的权利。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看，《我们的记忆》一书中相关口述者都以其典型角色彰显着自身在历史事件中的参与者和解释者的特定担当。似乎也正是源于此，那些来自于书中的访谈人物及其相关重要事件、对重要领域的整理与分析就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了。

郭存海主编的《我们的记忆》一书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借助口述史研究方法，见证相对于官方的个体“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普通人对于特定历史、历史事件以及社会变迁的个体经验。此种挖掘、梳理及分析的尝试恰恰也呈现出该书作者想要从建构个体、个人的生活历史、情感记忆和群体记忆策略层面来收集、整理和探究相关口述资料，以求有效呈现出某种诠释及建构的文化价值。

该书立足于收集中拉人文交流的记忆碎片和资料，其立场和出发点贴近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拉关系史主要由人文交流开启的历史事实。

依托人文交流成为中拉关系的新亮点和新焦点的前提，立足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立场，着眼于历史，深度挖掘中拉友好交流的早期记忆（典型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个体感受），此种打捞和整理中拉人文交流记忆的实践行动是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此种做法能够让一系列严肃、重大的中拉历史事件成为背景，个人在其中的喜怒哀乐成为主角，从而使得严谨的历史研究具有了温度。

一 打捞对象及内容：中拉人文交流见证者、参与者的体验与感悟

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中那些较有代表性的中拉人文交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具有拉美情结和拉美故事积淀的。“故事”在此成为捡拾中拉人文交流的记忆片段与细节的相关题材及类型。这其中的一些中拉人文交流见证者多为语言学领域的西葡语大师级人物、从事拉美研究的相关学界前辈、前任中国驻拉美国家大使，还包括相关中拉青年学者、记者和艺术家等来自多个阶层和领域的代表。该书在整体叙述过程中将各自人群在中拉交流范围内在对方国家的学习与生活体验及相关感悟作为表述的焦点内容而付梓。

中拉人文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一个跨文化沟通交流的问题。其中的“理解和沟通如何可能”就成为一个首先要认清和谨慎面对的问题，亦即如何有效呈现中拉两个世界相互碰撞中的相关群体是怎样认识和对待彼此的，以及如何有效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认知。这样的出发点带给人们的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就是，无论中国还是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受访对象基本上都是真心促进中拉友好与相互理解的典型代表人物，都是源于对中国及拉美的认同和喜爱。从该书的目录和框架中，读者们能够发现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该书中受访人物多是来自拉美地区的学者、作家、记者、导演和艺术家等，有着特定职业身份，隶属于特定人文艺术领域。他们都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喜爱，倾向于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大多数都是亲身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大都有着自身独特体验与感悟，大多数都是因为亲身感受而深深爱上中国的，这些特殊的经历自然成为拉美地区受访人士的重要口述内容之一。以这些典型人士为媒介和桥梁，以一种较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舆论领袖身份持久地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民众，利用的主要渠道和策略就是以亲身对中国的研究、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等形式来介绍和讲述中国故事，借助于故事讲述来不断增进拉美人民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似乎这也在另外一个层面向人们解释了该书将内容聚焦于拉美知识分子

之中国故事的本质原因。在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进程中，以故事的方式（尤其是拉美著名知识分子为主的、与中国之间的故事）天然具有超越文化差异的角色建构。“故事”是蕴含着母题的，此种母题在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流领域经常被理解为是文化传统中那些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它本是文学作品最小的叙事单位和意义单位，更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它能够在文化传统中完整传承，可在后世被不断延续和复制。这样来看，也就不难理解母题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①母题也能表现出人类共同体（包含氏族、民族、国家和全人类）的集体意识，也经常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识。因此，诉诸故事讲述，尤其是以个体访谈和深度对话等渠道，挖掘拉美知识分子在中拉人文交流中的故事线索和故事文本，本身就具有了话题的感染力和舆论的穿透力，同时展现出记录中拉人文交流的特殊视角。

《我们的记忆》一书主要访谈对象多为拉美人文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知名记者和艺术家等。这其中多数访谈对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对外交流机构、外交部门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和交往，这可以说是《我们的记忆》一书在访谈对象上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 挖掘深度与广度：立体、多方位的纵横跨越

此种较有特色的挖掘基本源于作者所坚守的基本预期目标，即“中国亟须向拉美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亟须阐释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外交思想”“中拉双方亟须加强相互认知和理解，增强战略互信，以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三个层面的阐释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作者在《我们的记忆》一书中主要遵循的技术路线及逻辑。该书采取一种追根溯源的讲述及呈现方式，也是源自上述基本目标与初衷的设计显现。该书在具体框架、章节展开进程中的叙事立场及基点的说明，注重从友好关系层面着重挖掘整理拉美地区相关人士和事迹、活动等，都可以为人们深入把握中拉人文交流的具体脉络提供可参视角。

结合该书在框架和叙述上的特点，能够看出作者主要从“打捞中拉人文

^① 参见 [美] 斯蒂·汤普森著：《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9页。

交流的记忆”这个焦点出发，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及层面寻找挖掘与整理的具体切入点。例如该书关注的受访对象中，来自阿根廷的古斯塔沃就是典型代表之一。由于在其国内没有更多关于中国的消息，而他能够找寻到的来自于美国、欧洲等西方媒体的信息报道立场决定了其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多为负面。源于其特殊身世和身份，主要扮演致力于向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同胞讲述一个真实中国的讲述者角色。古斯塔沃的最大贡献就是力求独立于西方新闻通讯社和媒体集团的报道视角来主动策划选题，也较为直接地提出了期待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今后能够在双向对话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从来自中国著名西方艺术史家啸声的访谈资料中，人们可以清晰发现啸声主要谈及在具体人文艺术交流中的相互认知和理解、转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怎样去讲述、记录和呈现这样的艺术交流命题，这其中包含怎样使用对比法来表现讲述的立场、讲述的价值出发点、具体呈现的领域及范畴，如何有效满足受众需求，如何利用已有知识基础去沟通交流等。再如，墨西哥的莉莉亚娜·阿芙索斯卡从“文学之窗里的中国风景”入手，详细畅谈自己和中国的渊源。她以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带给人们自己和下一代都实实在在地被中国所影响的故事。结合其多年来在职业和学术生活中“教中文、研究汉语、把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成西班牙文”的相关细节呈现，人们能够很容易把握受访对象莉莉亚娜的学者和翻译家的身份及一个“讲故事的人”的使命担当。这其中读者可以感受更多的是莉莉亚娜在自身亲历很多生活细节、有过共同生活经历基础上的恬静与坦然。翻阅故事讲述者莉莉亚娜在该书中谈及的事件和文字，也可以看出讲述者通过自身前后今昔对比，在认识中国、发现中国和了解中国进程中不断加深其间的友谊和交往。最有价值的还是作者借助“在差异中寻找共存”，以一种立体、多方位了解中国的窗口来达成“想象中国的方法与可能”。这表明，如何建立起人文交流的中介与桥梁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体访谈或沟通的具体效果，个人经历、个性讲述与宏大叙事及鲜明的意识形态区隔是要慎重的。

再如该书中提及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徐钟麟，他结合自身的成长历程指出，《今日中国》杂志的前身《中国建设》刊物出版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西方在拉美对新闻和出版的封锁和垄断，同时也是一种对古巴革命的有力支持。其中间接传递出《中国建设》在宣传重点和报道焦点层面对刊物基本内容和固有风格的坚守，在针对反面、负面宣传上的战略与战术的重要性，以及办刊初期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以启蒙性材料来阐述的做法。该刊采用一些新鲜、有趣、有助于捕捉受众注意力和焦点的引导性材料与稿件，说明

刊物本身的角色使命，即“文化交流铺路，外交建立关系”的先行者。从徐先生的娓娓道来中，我们似乎能够较为清晰地把握《中国建设》、改名后的《今日中国》西文版杂志相关编辑出版背后的珍贵史料。

如果说友谊是中介桥梁的话，那么智利的何塞·万徒勒里恰恰就是与中国外交事业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典型代表之一。从对其女儿和平·万徒勒里的访谈中，更能从细节上捕捉此种与中国外交事业密切关联的人文交流的某种厚重感。从上述种种材料细节梳理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这些人文交流口述史料反映出其访谈对象或主体多是与中国民间和政府相关组织联系较多、关系密切的人士。这些人士中有较多是接受过中国政府资助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留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好感与认同感。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系较为密切，正如前面提到的，此种人文交流又多与中国外交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其中的某种朋友关系及情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似乎可以说，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写成的，中拉人文交流的历史更是充满着细节和质感的人文艺术交流历史。此种人文交流是超越了大众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的深度体验及感悟的集合与汇总。此种交流跨越了遥远的空间距离，这些叙述或者呈现人文交流的人士又多与中拉双方都有着特殊感情。此种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所访问人群的特殊性和近似性乃是一般的口述史较为罕见的，他们大多数是与家庭成员一起参与人文交流与语言、艺术交流进程的。再有，多数人得到过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与关注，因此在身心上高度认同中国政府，而且还有效地参与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建，这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可以说，正是与中国外交人员、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之间的深情厚谊，决定了这些人在从事具体艺术作品创作时，能够从更为权威和集中的视角出发，讲述并呈现更为鲜见的细节和认知，同时还能与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有较好的关联与依托，这一点也更加有助于人们借助相关文献资料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同时，我们也需要明确的是，口述史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能够超越这个文化差异的口述史访谈则是充满着智慧和策略的。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桥梁和中介”的沟通、联结角色的体现，怎样有效理解和认知“中国心”也成为具体把握中拉人文交流跨越种种限制及障碍的一个关键点，这其中理应包括政治氛围、种族与民族的区别、宗教背景和信仰认同、文化因素等层面以及混合性因素、现代化影响等。

今天，我们能够从口述历史层面来了解和挖掘有关中拉人文交流的、活

在人们记忆中的相关资料、文化记忆，开展重建过去的相关认知活动，也能够了解到背后相关的潜层因素。人文交流需要有足够的信息、资讯、情报资料等，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发掘的渠道以及容量等也决定着今天人们能够读取的深度及广度。作为人文交流的中介载体，交流对象自身所属的相关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国体政体及其所从事的艺术、音乐等，能够担当起人文交流的内容资源角色，加之多数受访者为作家、翻译家或者外交事务工作人员，这其中也就存在着一种转换，即如何用自己的母语来传播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实质。这其中怎样解释中国、讲述与中国有关故事的转化能力成为影响人文交流效率、效果及质量的关键指标。正如卡洛斯·塔瓦雷斯所说的，“得向巴西人民解释有关中国的种种，这是我面临的巨大挑战。我要努力宣传中国，让巴西人明白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① 今天来看，这也是从“名称”上凸显出的“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卡洛斯·塔瓦雷斯，实际内涵就是特殊的爱，超越了一般的友谊。卡洛斯·塔瓦雷斯的做法在于纠正巴西人对中国的偏见，消除不真实的报道带来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这也是立足于从兴趣和可信度层面的分析与把握，并将其写入具体的文本之中。

访谈对象自身的考量标准在于对自己国家有利，同时结合自己的兴趣（专注于中国相关研究），其记者的职业身份可以很好地将个人的职业倾向、兴趣与服务的工作目标相结合。此外，也能看到以中国问题专家和专业记者的身份来接受访谈和介绍，意在强调此种介绍和阐释中国的客观立场和焦点领域的特殊性。受访者塔瓦雷斯有着中国情怀，其主要使命在于改善巴西人民对中国的偏见，也是帮助宣传中国，让巴西人了解真实的中国，这样的立场和切入点是重要和关键的。相对而言，胸怀拉美情结的徐世澄作为中方代表性学者，主要的贡献就在于著作涉及面比较广泛，主要包括相关的拉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以及古巴、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别研究。再如埃科托·莫拉和安德烈斯·莫拉父子主要以纪录片题材与形式记录中国来为人文交流提供参考和帮助，他们主要从国际热点问题入手，立足于哥伦比亚视角进行客观报道，讲述世界形势并记录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依托电视纪录片形式介绍风土人情、文化等传递中国经验和社会进步，今天来看这是更为深入地理解多元社会的发展势态，有效补充人们相对稀缺的信息框架与认知。其中较为值得称道的是在人文交流中始终立足于对中国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这一点

^① 郭存海主编：《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年，第107页。

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带来长久的、持续不断的交流。两位都是主要从纪录片的视角向哥伦比亚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其间沟通桥梁的角色作用特别明显，有效促进了拉丁美洲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这也是源于中拉之间促进对话和不断营造沟通空间的大环境，并为不断推进中拉文化交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前提。

在语言文化及人文交流层面，国内的郑书九教授的贡献是在语言教学层面开展深度的人文交流、教学与研究，主要精力集中在拉丁美洲文学研究领域内。而吉叶墨·达尼诺作为秘鲁汉学家、翻译家和演员，其在人文交流层面的贡献集中在中国文化研究层面，与之相对应，乔建珍教授在中巴文化教育经济交流领域的成绩与贡献是在孔子学院项目上的拓展和延伸。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的乌拉圭人比森特·罗维塔及其儿子巴勃罗·罗维塔致力于推广和销售中国主题图书和报刊，开展中国与乌拉圭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事业活动。哥伦比亚人恩里克·波萨达·卡诺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相关重要政策文件，与之相对应的赵德明教授则是中国著名西葡拉美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这里，能看出整理者在挑选中拉人文交流访谈对象上的某种追求和精心安排，正是在“你来我往”的浓郁氛围和相互切磋中，中拉人文交流才会绵延不断、前赴后继，才会为中拉交往的深度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综观来讲，《我们的记忆》一书的主要特征是对人文交流主体，也就是对“人”的持续深度关注，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任何形式的人文交流中都不能忽略的主体。以人和人之间的活动、人们的情感及情怀为线索和逻辑主线，注重突破相关政治氛围、种族与民族、宗教背景和信仰认同、文化因素、混合性因素等方面的束缚与障碍。此种挖掘和整理能将上述较为典型的访谈个案汇总在中拉人文交流整体框架之中，进而构成一种今天看来在信度和效度上都能够达到标准、规范的呈现状态。

《我们的记忆》一书作为一部不断被阐释、阐发的文本，也不断面对着来自国内外学术界、来自中拉人文交流热心人士等的新阅读和新引申，这也恰恰回应了口述历史在访谈资料整理上的特质。作为一种质性资料，相应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经验现象的描述与呈现上不具有唯一的、精确性的特点，也就意味着此种表述与呈现方式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这似乎也在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号，可能会有越来越多有关《我们的记忆》的理解、阐释、解读，我们也乐见诸如此类的阐释与解读文章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 黄念)